

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

张晓虹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同治年间,因回民起义军“不杀在(天主)教人”,引发了陕西汉族百姓纷纷皈依天主教以避战乱,天主教在陕西境内迅速扩展。从而揭示出清代末年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关键词】 同治年间 回民起义 天主教 陕西

【中图分类号】 K252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2)05-089-006

The Hui Nationality Uprising and Catholicism in Shaanxi Province

Zhang Xiao-hong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During the Tongzhi Period, due to the hearsay that the Hui Uprising Army “do not kill Catholics”, many Han peopl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to keep themselves safe. This resulted in rapid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Shaanxi Province.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vents, this paper aims to bring to 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read of foreign relig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ongzhi Period, the Hui nationality uprising, Catholicism, Shanxi Province

同治元年(1862)壬戌夏四月,陕西回族在关中东部的华阴暴发起义。回汉两族之间相互仇杀,随即暴动蔓延至关中各地、陕西全省以及相邻的甘肃省,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

这次回民起义无疑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尤其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造成了关中、陕北地区人口锐减,土地大面积荒芜。笔者在研究晚清陕西宗教分布时,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即地方史志中普遍认为陕西各地,尤其关中地区天主教的传播,是因为同治回民起义时回民不杀在教人引发的。若按此线索作进一步的考察,也许有助于廓清晚清天主教在陕西省内的传播历程,同时对我们深入了解近代文化在陕西境内的传播特点大有裨益。

基督教进入陕西早在明代末年,“泰西两教之播布关内,始自明末清初”(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中华归主》中将天主教进入陕西的年代系于1625年(天启五年)^[1]。但比较确切的标志应是陕西泾阳人王徵于1628年(天启八年)在陕西筑有第一座教堂——“崇一堂”和一处住院^[2]。此后直至清初,即使是在明末战乱年间,天主教仍在陕西暗中发展。

进入清初,罗马天主教会依然关注着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先后派遣传教士进驻陕西。1657年至1662年(顺治十四年——康熙元年)法国人穆格我(Claude Motel)神父被派往陕西传教。

* 本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99CZS002)和复旦大学亚洲基督教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 2001-12-11

【作者简介】 张晓虹(1965—)女,河北景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1680—1684年间(康熙二十—二十三年),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副省会长陆泰然(Andrea-Giovanni Lubelli)曾到山陕教区巡视。与此差相同时,法国神甫方德望(Etienne Faber)独自在汉中地区传教,归化信徒,建立教堂。

此后的百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使康熙帝及其后继者雍正帝改变了过去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宽容态度,转而实施比较严厉的禁教政策。康熙四十六年(1707)下诏,令愿在中国继续传教的传教士必须声明遵守利玛窦的规矩,方可领取内务府的“印票”继续传教,否则一律递解出境。同时也对中国的天主教教堂及信徒实施了限制。自此,陕西教会也与中国内地的其他教会一样,进入一个低谷时期。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陕西教会仍在暗中活动。据《清高宗实录》中的有关记载,乾隆年间,西洋人李世辅神甫一直在山、陕地区传教。而罗马教会方面也承认,他们一直不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各省,当然包括陕西教区在内。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夏天,四位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由澳门起航,欲往陕西教区。只是他们未到陕西就在湖北被清廷捕获。更不幸的是,此时正值满清政府被蔓延在陕甘一带的回民起义弄得焦头烂额,遂将教会派遣传教士进入陕西这一事件与回民起义联系起来,认为罗马教廷是在得知西北回民造反后,欲派人到陕西暗通消息。清廷立即诏令对全国的传教士、天主教教徒“迅速严拿,一并解京,归案办理”(《清高宗实录》卷1215)。无疑,这次教难给陕西天主教事业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所有教堂被毁,一批欧洲和中国神职人员或捕或逃,天主教徒被勒令放弃信仰,甚至连带着那些允许外国人进入本地的地方官员也受到了处罚。好在此次禁教时间持续甚短,乾隆五十二年(1787)后禁令就逐渐松弛,传教士可以暗中继续他们的传教活动了。

随后的嘉庆、道光两朝虽继承了前朝的禁教政策,但天主教传教士在陕西境内布道活动一直持续不断^①,只是发展甚为迟缓。嘉庆五年(1800)时,据罗马教会方面估计,山、陕和湖广等地共有6万教徒,其中陕西教徒大约2万余人^[3]。

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凭借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开始在中国境内大肆开展传教活动。为了扩展势力的需要,陕西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从山西代牧区分离出来,成立了新的代牧区。尽管当时还有“定例五口通商以外,不准该夷擅入内地”的明文规定^[4-p162],但大批传教士毫不顾忌,接受教会的差遣,纷纷从口岸城市进入内地传教。在陕十数年的意大利人龚山林神甫的经历,当能反映在陕外国传教士的情况:

据龚山林供,……素习天主教,伊通晓汉语,经本国发给执照,同廉神甫由海道至广东澳门,改换衣冠,潜入内地传教。廉神甫中途病故。伊于道光二十四年由广东来至陕西高陵县,遇见在彼寄寓之山西人高一志,捏称同乡央留居住。高一志因患瘫痪病,随伊念经,吃斋祈福。旋有高陵县人李茂禄、李信,城固县人王学书,沔县人谢若望,先后随伊习教。嗣李茂禄迁居汉中府。伊于本年四月带同谢若望、李信同往探望,行至留坝即被盘获。^[4-p177]

显然,龚山林至此时已在陕西潜住长达十七年之久,只是因其“饮食衣服言语直与土著无异”,加之“天主教向不敛钱,并无托言邪术,煽惑夜聚晓散等事,民间不以为怪”,所以直到咸丰年间才被发现。

不过,尽管有这些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勇于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传教士们,但是陕西天主教发展仍很缓慢,天主教徒人数几无增长^[5]。而从罗马教会在1867年(同治六年)估计陕西有2.3万余名天主教徒来看^[6],也确实较鸦片战争以前无甚进展。

① 参见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中的有关记载。《清末教案》上,《湖广总督裕泰等奏报查办潜入内地意大利传教士李若瑟等情形摺》载:“山陕地方都设有天主堂。”另据李伯毅《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一文中称,自明末至道光初年,高陵县通远坊一带一直有教徒活动,从康熙至鸦片战争之前,先后主持陕西教务的有兰溪主教、方济升主教、罗静雅主教和冯尚仁主教等意大利人。在此期间,不仅通远坊建有教堂和修院,在渭南葛家沟也修有一所教堂。载《中国天主教》1998年第2.3期。

正当陕西天主教的传布处于迟滞,传教士一筹莫展之际,一场大动乱在关中地区悄然拉开了帷幕。

明清时期,回族已形成了聚居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分布格局。同治之前陕西号称“民七回三”^①。此处所谓的民,即为汉族。也就是说,陕西人口中回族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人数有百万之众。而这近百万的回族,约分为八百余坊,散布在关中及陕北各县。

回汉比邻而居,不同的宗教信仰,迥异的风俗习惯以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等等都成为产生矛盾的根源。终清一代,回汉民族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回汉因此械斗者,不一而足,几于无岁无处无之”^[7]。加之,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汉族官员抱有严重的民族歧视心理,认为“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需要地方官员“严加惩治约束”(《清世宗实录》卷80)。这样的态度更造成回族积怨深重。因此,当同治元年(1862)渭南回民因越界砍伐华州汉民竹木,被击毙二人,而华州、渭南两县官员又明显偏袒庇护汉民时,顿时“回情怨沸”^②,引发了回汉之间激烈的械斗。随之暴动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至关中各地,乃及于全陕,最终酿成绵延数省、持续数十年的回民起义。

由于其起因及历史渊源,都使得这次回民起义带有明显的民族战争的意味,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族仇杀的现象。尤其是战争初期,关中地区顿成屠场,“渭河南北各州县汉回互相残杀”(《清穆宗实录》卷30)。加上后来平乱中死亡的义军及其随后大批迁出回族,陕西人口锐减。据曹树基先生研究,在这次起义中,关中地区人口约损失了45.8%,而陕西合省人口死亡约466万^[8]。

就在回民起义的第二年(同治二年),为索取西安府和城固县两处教堂之事,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照会恭亲王。他在照会中有这样一段话:

该处官吏等为欲凌虐奉教人,无可藉口,遂指称教中有暗通回匪等情,谅贵亲王应已深悉,近今十年以来,无论何处,一有贼至,每每奉教人先遭荼毒,非独毫无通贼之事,且较之不奉教者受害尤多。目今此种污蔑之词,固可毋庸深辨。^[4-p366]

从时间上来看,其时正值清军在战场上获得了主动,回乱稍歇之际。满清政府惊魂未定,对于通匪情事自然异常敏感。况且,如前文所述,乾隆年间就曾发生过因怀疑传教士暗通回民义军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教难事件。故此,对于“暗通回匪”这一指责,法国公使必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为教会摆脱干系,如此才能在索取教堂问题上争取主动。

但事实究竟如何?

同治五年(1866年),陕西巡抚刘蓉向中央汇报陕西“匪”情时称:

同治元年,陕省回变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乱,凡属汉民村庄无不焚毁,汉人男妇无不伤残。至今蔓草荒烟,几无寸椽片瓦。独该(天主)教人所居高陵通运(此应为“远”)坊五村毫无凌犯,屋宇庐舍,岿然独存,谓系同教之人不加戕害。由是汉民之畏死避祸者,往往投入彼教,冀获幸存。是其同类相护,亦既显有明征矣。^[4-p538]

此处地方官员虽然并没有明指天主教暗通回民军,但认为天主教教徒在杀机四起的关中独得自保,显然是因为回民认为教民是“同教之人”的缘故。正因为认定天主教有此“前科”,在回变间歇之际,陕西地方官员因担心西安城内回、教勾结,有“今若许法国教堂居然设立城内,实虑潜相勾结,为祸萧墙”之虑,所以不愿交出西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并咬定天主教会一定会因回民军“前次既有不加伤

① 《秦陇回务纪略》卷1。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76《纪事十·平定回匪四》载:“原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邠、鄠三州二十多州县里住有回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

② 《秦陇回务纪略》卷1载:先是,回民上诉到华州署,而“华州牧因回民越界砍汉民竹,将砍竹者痛罚”。回民不服,再回到渭南,“诉之于本邑。邑令曹士鹤不准理,反以荷校辱之。”由是“回情怨沸”。

害之情,日后必有阴相庇护之势”[4-p538]。

由此看来,教会得到回民军的庇护,在当时的陕西地方官员看来已成确凿的事实。且在地方官员眼中,这一行为显然有通匪之嫌。除了官方公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外,地方志中对此更是浓墨重彩:“天主教则自咸丰中天津议和,法教士驻高陵神甫来鄂传教,而从者尚属寥寥。自回匪猖獗,不杀从教之人,由是从者日众”(民国《鄂县乡土志·宗教》),并认为这是人们皈依天主教的唯一原因。

至于当时的情形具体如何,我们只能从民国时期编纂的《宪政调查报告书》中得知其详情:

同治元年回变将作,法教士高一志时在县西之通远坊传教,与叛回为首者相约,凡县民在教者特异其标识、彼此无相侵害。后果坚明如约。

此处并没有提到回民认为天主教是“同教之人”之说。实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虽同属外来宗教,但其教义、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都大为迥异,自不可能有“同教”之念^①。真正的原因,倒可能真如上引文所云:是高陵主教高一志事先曾与回民军首领相约,互不攻伐。而从后来的传闻来看,回民军似也坚守了和约。

且不管具体情形如何,显然在关中地区广为流传的这一说法,吸引了大批正苦于回汉仇杀的普通汉族百姓,使他们认定这是一个可以暂避厄运的机会。因此,“自回匪猖獗,不杀从教之人,由是从者日众”。现实中,高陵通远坊附近四、五村之民相率入教即是其中的显例。而这样的例子在关中地区并不少见,如民国《兴平县乡土志》同样记载了当地因“同治元年回变作,邑人之黠者多归附天主教,得偷生焉”。

不过,在陕北的靖边县,情形与关中地区有所不同。教会在回民起义中,通过用武力保护教民,而因此获得势力的扩张:

(靖边)县属宁条梁镇之小桥畔,法人传教有年,于光绪二十年间,以甘肃回乱,教士马文明等在教堂周围筑土寨一,其地皆早年买到,其工皆雇人兴筑。当时大府飭查县令丁福奎覆称系为防守教堂起见,并无他意。上游亦遂置之。自是厥后,入教之民益夥,辟田日广,置产日多,自小桥畔以及张家畔垦地无虑数千顷,俨成殖民区域,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其势力似较高陵、城固两堂尤为雄固,亦他日塞上之隐忧也。(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

虽然,此处与高陵通远坊的情况完全两样,教会凭借的是实力和武装。但共同的是,在生死攸关之际,教会保护了教民。而这一点正是普通中国百姓孜孜以求的。

正是在回民起义中,有上述两种现象,因此,在陕西就有了直接将当地天主教兴盛的原因归于回民起义的观念,甚至还产生了“迨多忠勇(隆阿)、左文襄(宗棠)公统兵西麾,扫清关陕,回种亡,天主教盛”(民国《兴平县乡土志》)之说。

事实上,我们从陕西基督教的发展历程来看,同治年间也确实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1867年(同治六年)陕西计有2.3万余名天主教徒,由7位外国神父和17位中国神父引领。但此后,陕西天主教显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1920年(民国九年),陕西全省天主教徒已达5.7万人,共有天主教堂300余所,分设149处。其中外国神甫28人,外国修女38人,中国神甫38人^②。不仅人数较之同治年间翻了一番还多,四十年间受洗的信徒是前三百年的总和,而且“天主教亦遍行乎三辅及山南山北之区”(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这虽然与中国当时大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定有回民起义直接的“功劳”。无疑,此次起义中教会的行动为当地百姓树立了一个榜样,即上帝可以庇护他所特选的子民,使其免遭厄运。这对于把宗教信仰作为一种趋利避害方式的国人,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说,正是回民起义这一契机,使得陕西

^① 但《古兰经》中认为,有信仰的人要比无信仰的人优胜,而在回族中也认为信教(无论何教)的汉民优于不信教的汉民。

^② 《中华归主》,439页。另据《陕甘调查记》载,陕北有天主教徒二千二百五十人,关中为三万五千余人,陕南有一万四千三百余人,合计有五万一千余人,与《中华归主》的统计数据略有差异。《北方杂志社丛书之一》,第14—15页。

天主教获得了一次扩展势力的机遇。民国时期有人即已注意到这一现象：

每雍部更一变，西教必为之一涨。迨乎庚子之乱，小桥畔一案，赔款颇多，由是三边之地投教之民日繁，租种之田日广，遂有边墙千里成为天主教殖民地之称。斯亦教事之最宜注意者矣”（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

三

其实战乱并非陕西天主教蔓延扩散的根本原因。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的作者在总结清末民国初年陕西各地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时，曾这样说道：“关中民目天主、耶稣为洋教，并不判其为公教、修教也。且亦未悉修教之较胜于公教也。从之者贸然，主之者茫然，不过缘权势财用之驱迫依附已耳！”此语道出了关中士民崇奉基督教的实质。

不惟关中民众如此，也不惟视基督教如此，象陕北靖边县民众“贫者崇奉天主教以图存，富者崇奉佛道二教以祈福”（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出于同样的理念，地处陕北的葭县民众，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佛道、巫覡视为同类，不过是祈福避灾的另一种方式：“民俗迷信鬼神惑于巫覡，许愿祈福习以为常。昔时专信佛道，近年设有耶稣天主等教堂，信奉者甚夥。”（民国《葭县志·风俗》）。换言之，在中国，教徒对上帝的祈求，主要是集中在现实焦虑和世俗需要上，已把灵魂拯救异化成传统的神功崇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当然不只出现在陕西，中国各地对待宗教的态度大多类此。但是与佛道的报应多是以一种虚幻的或神奇的方式出现不同，在晚清时期的国人眼中，皈依天主教，还有别的宗教难以给予的现实关怀。

自咸丰年间天津议和，始启教讼。借助列强的坚船利炮，各国政府多方面庇佑其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团，传教士对其属下的教民扛帮庇护，直接干涉词讼：“现惟牵涉教务之件，其主教不免从中扛帮庇护”^[4-p541]。尤其是天主教，常倚本国的势力干预诉讼，包庇教民。而一些不法平民也藉此以逃避政府的法律。如平利县的教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洛河民人袁瑞林、刘子模充当地团保，因浮派烟地稅钱被民人詹朝珠等控官责革，后遂相率入教。本年五月间袁瑞林赴教堂，声称詹朝珠等串同川匪何裁缝在洛河一带毁谤教会。教士毕德修抵书平利县知县王宗濂请速查办。^[4-p658]

清末发生在陕西各地的教案大多如同这起案件一样，一些不法教民借助教士的干涉，在词讼中取胜。无疑，教士的这种做法引起当地百姓与地方官员的极度反感。

然而，清廷的软弱无能，害怕惹起事端，使得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往往进退维谷：一方面痛恨教民的不守旧习；另一方面又惧怕严惩教民之后，在外国领事的压力下受到上级的斥责，甚至革职查办。比如同治四年（1865）陕西盩厔县知县曾因教民二人不肯出费修庙，遂拘禁并杖责百余。但这位官员后来就受到了上级官员的申斥^[4-p468]。因而，不少官员即使是对教民强烈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作为朝廷在地方的代表，当地政府对待教会与教民态度的前后反覆，使得普通百姓发现，天主教会俨然已成为一股可与官府分庭抗礼的势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其势力已在官府之上。故在受到官府不公正待遇之际，一般百姓在无法依仗其他势力时，遂希图通过加入教会组织，藉教会之力以获得自己以为公正的待遇。这种情况在清末的陕西各地比比皆是。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平利县民刘先楷“因讼曲，赴郡城入天主教，希图倚势凌人”。显然，此事得以成功，所以才会有当地“无赖者纷纷以入（天主教）”（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的现象产生。

正因为此，时人对平民入教，普遍抱有“中国莠民最多，往往借入教为护符，横行乡里。教士受其蒙蔽，仍予优容”^[9-p230]的看法。即使也有相当部分的良善之辈是“因信教而入教者”，但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更多的却是“不肖之愚民遂倚此为逋逃藪矣”（《宁羌州乡土志·宗教》）。

不可否认,在包揽词讼、干预内政之外,由于基督教传教团良好的组织,更多的百姓希图通过加入教会,以提高自身抵御灾害的能力,由此而将基督教会视作福祇之所在。事实上,传教士们也往往利用中国百姓这种功利心理,达到其传教的目的。这从光绪大灾时天主教会所为可见一斑:“光绪二十六年(1900), (宁羌)州西大饥,法国天主教士郭锡德以赈饥为名,诱民入教,泊来者日众”(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明显地,陕西天主教会将此次灾荒视作解救苦难、传播福音的机遇,通过赈济灾民,扩大自己的影响,使得相当一部分的普通百姓皈依天主教。

对于在华基督教传教中存在的这种弊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点,指出传教士传教的目标与中国人信教目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西人入中国传教,劝人为善,志本无他。无如中土人心风俗日漓,教民之真心信道者百中不过一二,恃洋人教堂为护符,狐假虎威,藉以欺压良善抗制官长者则十常八九,与新旧两约之理固大相径庭。^[9-p266]

由于相当一部分教民不是因为钦慕教义而皈依天主教的,对天主教的教义及其宗教活动相对淡漠,以致于“每逢礼拜赴堂诵经者尚属寥寥”(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此当然大失天主教会传教之本义。

然而,这一现象毕竟是在清末中国内外交困这种特殊的情形下诞生的怪胎。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天主教传教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种现象逐渐得到了纠正。相当多的传教士随后改变了传教策略,不再依靠利益驱动其传教事业的发展,而是深入城镇乡村,宣示教义,来吸纳真正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愿意选择基督一样生活的人们进入上帝的殿堂。如葭县的天主教士即由初始“对地方教民词讼案件尚加干涉”,转而“渐谨守条约,除传教外,他非所闻问,是以民教之间可相安于无事云”(民国《葭县志·宗教志》)。到了民国年间更是如此。大多数的教民都能谨守教规,遵礼守法。如凤翔县“(天主、耶稣)两教信徒类皆谨守教规,恪遵宪典”(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陕南西乡“教民循谨,与世无忤”(民国《西乡县志·风俗志》)。不过,这一传教政策的转变,很自然地会让那些原本企冀以教会为依恃的百姓退避三舍,短期内或许影响了传教的效果,如前述平利县先前曾因教士包揽词讼,致使民众纷纷入教,然而“近数年来民见入教并不足恃”,所以“崇拜者少”(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此即明证。但是,正因为不再借助利益诱导,直到这时基督教的传播才回归到其本义,向真正信服之人传播福音,使他们皈依上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M](以下简称·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39页。
- [2] [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M],耿升,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 [3] Les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 12, P333,转引自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4] ·清末教案·[M]。
- [5]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6] Annals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Vol. 28, pp. 69—91.
- [7] 秦陇回务经略[M]卷1。
- [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601页。
- [9] 清末教案·[M]第三册。

[责任编辑 周 珉]

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

作者: [张晓虹](#)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2, "" (6)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9条)

1. [中华归主: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 1987
2. [耿升 \[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 1998
3. [Les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Vol.12,P333,转引自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4. [清末教案·](#)
5.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6. [查看详情](#)
7. [秦陇回务经略卷1](#)
8. [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清时期](#) 2001
9. [清末教案. 第三册](#)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高小岩. Gao Xiaoyan 李得仓对近代张家川的影响——兼论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 - [昌吉学院学报](#) 2008, "" (6)

在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中,李得仓率领“南八营”起义军转战于陇东南一带抗击清军。最终由于形势所迫,接受招抚,客观上达到了维护民族权益、削弱封建专制压迫的目的。李得仓成为地方官员之后,向清廷争取回民的正当权益,促进回汉团结,支持民族宗教事业,为近代张家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李得仓,不仅有助于客观看待回民起义尤其是对研究近代张家川的形成与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2. 期刊论文 [马强. MA Qiang 从口述中找回历史: 马长寿先生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 [回族研究](#) 2007, "" (1)
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是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事件的记录和分析。从人类学角度审视,其研究价值有四,即弥补资料之缺失、赋予历史以真实、反观自身之文化、理解他者之心灵。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的民间立场和叙事,弥补了以往资料多出自官府和汉族士绅及内容和观点偏狭之不足。就此可以看出马长寿先生是一位学养丰厚、眼光敏锐、博与专结合的人类学家。

3. 期刊论文 [杨永福. 杨红伟. Yang Yunfu. Yang Hongwei 试论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前后的回汉民族关系](#) -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 "" (1)

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甘肃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起义发生后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初期比较普遍地存在互相仇杀的现象。同时,回民军领导人在主观上有改善回汉关系的愿望,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根本改变民族关系的逆向发展。回汉民族关系对起义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4. 学位论文 [武士靖 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迁徙研究](#) 2009

清同治年间发生的陕甘回民起义是近代西北社会及回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而且引发回民居住地域的巨大变迁。

清后期,国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而此时的陕甘地区社会经济问题也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汉、回摩擦不断。同治元年,太平军到达长安,使回、汉矛盾进一步激化,回民起义在关中地区首先爆发,并扩展到甘肃。在清政府的镇压下,回民起义以失败告终。战后,清政府对陕甘回民进行了重新安置,使其居住地域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陕甘地区除西宁、河州等地回民得以留居当地外,大部分被左宗棠强制安插在甘肃平凉、静宁、隆德、会宁、安定、秦安、清水、固原等地。同时,白彦虎一支远达中亚。起义过程中,还有部分回民四散逃离,流落到陕南、四川、内蒙古等地。这次回民迁徙,系由原来条件优越的河谷、平原地带迁往贫穷、荒芜的山陵地区,地域区分显著,而居住地则更为集中。各地回民(尤以陕西回民为主)被迫迁出原居地,使当地人口减少,经济发展缓慢,随之引发外地移民的进入和一些文化新现象的出现。而对迁入地来说,回民的进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并带来行政建置的变更。更为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今天西北民族的分布格局。

总之,同治年间发生的这次回民迁徙活动,其发生过程和变迁是复杂而显著的,对西北地区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5. 期刊论文 [拜学英 悲壮的历史 不屈的往事——读《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 [回族研究](#) 2000, "" (4)

公元1862年,陕西爆发了历时17年的回民反清起义,对这段悲壮而不幸的历史,官方的记载失之公允。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长寿和他的弟子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就回民起义在各地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得到了来自民间的真实宝贵资料,后历经曲折,终于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问世。

6. 期刊论文 [杨志娟 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 -民族研究2003, "" \(2\)](#)

清同治年间,地处西北的陕、甘两省人口下降1500万之巨,为历史所罕见,是近代中国人口继咸丰年间大幅度下降后的又一次锐减.本文认为,战乱以及频繁的灾荒是造成这次西北地区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并对此作了具体分析.

7. 期刊论文 [杨利 陕北民歌与晚清民初的回民起义 -传承\(学术理论版\) 2010, "" \(1\)](#)

陕北民歌中的〈调兵曲〉、〈高大人领兵〉等歌曲反映了近代同治年间陕北回民起义的一些情况,文中论述了回民起义的原因、事件经过、善后工作、失败缘由、起义的影响等,可见陕北民歌对陕北近代历史文化有呈现功能.

8. 期刊论文 [僧海霞, SENG Hai-xia 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 \(4\)](#)

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历时近十年的回民起义,关中地区信仰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中和战后,以庙宇为主体的信仰景观经历了新建、重建和废弃,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见证了区域民众对信仰客体的重新选择.庙宇是信仰存在的表征,它的暂时缺失未必造成信仰的中断或消失,庙宇的建造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信仰的变迁.

9. 期刊论文 [赵维玺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 \(3\)](#)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10. 期刊论文 [虎隆, 马献喜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 -回族研究2006, "" \(3\)](#)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引证文献(1条)

1. [僧海霞 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 \[期刊论文\]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h-shkxb20020601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54ef9532-c22d-46de-98d4-9e4d007ed30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